

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

克雷格·卡尔霍恩 文/陶文佳 译*

内容提要 哈贝马斯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分析了17至20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并提出理性-批判性辩论是这一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本文首先回顾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特别是其前半部分的主要论点；其次，指出正是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公共领域的衰落不可避免，才导致他在其后期著作中转向交往行为理论；最后，本文提出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存在的一些内在问题，如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深入分析，忽略了文化、身份、宗教、科学等因素对公共领域的影响，以及对多重公共领域的忽视。作者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哈贝马斯理论继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公共领域 理性-批判性 意识形态

* 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大学教授；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现为智库博古睿研究所 (Berggruen Institute) 第一任所长。英文原文收于《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 The MIT Press , 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and Landon , England , 1992) 。译者陶文佳，哲学博士，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湖北省道德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本译文系湖北省教育厅“西方平等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变革” (16Q026) 的阶段成果。以下注释凡未注明出处者皆为原注。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混杂人群（不仅有学者和智者，也有商人和女人）的对话过程，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讲故事和说笑话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种休闲活动，这就是批判。

——伊曼努尔·康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早期的重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以下简称《结构转型》）一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何时、何种条件之下的辩论能够成为政治行为的权威基础。他展示出这一问题对于民主理论而言是如何至关重要。他问道，需要哪些社会条件，才能由那些愿意令论证而非社会地位来决定结果的私人个体来主导关于公共事务的理性－批判性的辩论？这一追问不仅针对规范性的理想，也针对现实历史。该问题聚焦于从17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但它的目标是超越历史中那些有缺陷的现实，去发现某种在规范性上一直都重要的东西。这便是实践理性在公共事务中的栖身之地，也是随之而来虽然经常具有欺骗性却合法的对于形式民主的各类主张的栖身之地。人们在诠释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时通常会认为，历经多年后，他从一种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倾向转移到了某种康德主义的倾向。虽然并非全无真相，但这种观点低估了哈贝马斯知识工程的统一性。康德作为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全面表达的理论家，在《结构转型》一书中也占据了核心地位。在这一公共领域中，实践理性通过合乎逻辑地对话的各种规范成为约定俗成。这些对话中，只有论证——而不是社会地位或传统——成为决定性因素。虽然哈贝马斯反对康德的认识论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对于哲学非历史性的拔高——将其视作一切科学和文化的裁决者和基础。然而在哈贝马斯最近的作品中，他却仍然论证到，对现代性的康德主义理解中仍然有某种关键内容。除开所有其他内容，这是一种概念，关于“程序理性及其在客观知识、道德实践洞见和审美判断三个领域为我们的观点提供可信性的能力”^①。这种程序理性从根本上就是把判断植根于推理。

哈贝马斯在《结构转型》中的任务是发展出一种对于这类资本主义社会

^①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1990), p. 4. See “Law and Morality”,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 8 (Salt Lake City and Cambridge, 1988), pp. 217 – 299.

的批判，显示出（1）这一社会的内部张力和导致其转型和部分衰落的因素，以及（2）尽管这一社会有意识形态扭曲和矛盾，却仍然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和解放的可能性。从前述康德的引文中，最关键的问题都暗含其中，虽然表述得较轻巧。简而言之，一个合乎民主政体需要的公共领域既依赖于讨论的质量，也依赖于参与者的数量。哈贝马斯详细描述了17至18世纪经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如何以理性-批判性的论证构成的，在这种公共领域中，论证的优劣而非论证者的身份才是关键。通过这一描述，哈贝马斯研究出第一个必备条件。那么，从康德那里得出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论证的普遍性；这种对理性的运用才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有缺陷的意识形态中最有价值的内核。康德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精英主义，因为他提到就连那些商人甚至是女性都有可能辩论，但侧重点也可以放在积极的一面，因为参与辩论就是教育的一种手段，而教育又能够克服让一些辩论者低人一等的弱点（因此，这与永远地排除某些人的专属社会地位标准全然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从更消极的角度来阅读康德，我们就会看到，商人和女性并不是“机智的理性者”，并碰到了导向公共领域之衰退的辩证法。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组成是欧洲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主要是受过教育、有财产的男性，他们主导的讨论不仅排除了其他人，对那些被排除之人的利益也抱有偏见。尽管如此，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公共领域的转型则主要取决于它持续不断地扩张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同时也取决于作为个体参与者之间调解人的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发展）。他建议，最终，这种包容性带来了讨论质量的下降，但他还是主张，民主的要求和当今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性质意味着，今天不可能通过回到精英主义的公共领域来继续前进。

在这篇论文中，我计划主要为不熟悉《结构转型》一书的读者提供对该书的一览。我会简要地找到《结构转型》一书在哈贝马斯知识工程发展轨迹中的定位，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的批判性评论和阐述。

—

《结构转型》一书诞生于争议之中，也极有可能会继续引发更多争议。它最初是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在德国，教授们都要求为其博士后资格提

供一篇论文), 并准备提交给法兰克福的马克斯·霍克海姆(和西奥多·阿多诺)。然而, 霍克海姆和阿多诺显然认为它既在批判启蒙主义的民主公共生活——特别是在大众社会——概念中的幻觉和危险倾向时不够充分; 又太过激进, 因为该文在政治上专注于呼吁为了追求真正的民主而超越那些自由主义的宪法保障的尝试。哈贝马斯成功地将这篇论文提交给了马堡大学的沃夫冈·阿本德洛特^①。《结构转型》一书在早期学生运动时影响很大, 但很快遭到了来自他们的批判, 那些年轻的左派们攻击它专注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却排除了无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因此并没有充分抓住发达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 并夸大了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解放的可能性^②。哈贝马斯本人显然也对这部著作不甚满意, 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相关主题上大量的经验性研究, 因为该书的翻译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多年以来都想重新修改这一文本。他一直没这么做, 但读者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哈贝马斯后来的那么多主题都已经在这本书中有所预见(并经常提供了这些主题的大部分社会学处方和特定的历史学处理)。该书还加入了与 20 世纪中期其他关键作品有趣又重要的对话, 特别是汉娜·阿伦特的著作^③。这本书仍旧极富提示性, 是在其主题上最重要的当代作品。

该书的主题是 17 至 18 世纪在资本主义和国家间的关系中创造出来的特定历史现象——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想要建立的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公共范畴意味着什么, 以及在这种“公共”范畴建立之后的几世纪中它的含义和具体操作是如何转型的。这一任务的动机主要是试图复兴“形式”民主和法律的进步性可能, 并由此抵消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它们的忽视。^④ 更加具体地说, 这是哈贝马斯一生努力要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从而走出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战后年代的悲观主义困境。简而言之, 就是试图在无

-
- ① 在第十七章中, 哈贝马斯提到了他对阿本德洛特一直以来的欣赏, 但也表明他现在反对阿本德洛特大部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对于全面社会转型的乐观。
- ② 内特和克鲁格著, “The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内特著, “Mass Media: Tools of Domination or Instruments of Liberation? Aspect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ommunications Analysi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14, (1978), pp. 61–80。想要了解更广泛的讨论, 请参见霍亨达尔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1982)。
- ③ 主要参见汉娜·阿伦特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1958)。
- ④ 参见 J. 科恩, “Why More Political Theory”, *Telos* 40 (1979), pp. 70–94, 特别是第 74 页。

产阶级毁掉的基础上再重建一种对于社会转型和人类解放的愿景。法西斯极端主义的经历、文化产业的冉冉升起和“被操纵的同意”似乎都暗示着并不存在某种历史学科能够让批判者们寄予希望来超越资本主义。哈贝马斯不再寻觅这样的学科，转而发展出一种跨学科的交往过程以及它们解放的潜力，来取代任何关于这一主题的哲学（或政治学）。与此同时，哈贝马斯还试图在他的理论中融入对于变化之影响的全新欣赏，这种贯穿于西方现代化时期的变化既发生在资本主义中，也发生在国家结构上。大企业的兴起、消费的问题化（它是对生产能力成功增长的回应）、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大众民主，这一切都既改变了构造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条件，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讲，《结构转型》也与前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从自由资本主义到“有组织”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大多并行不悖。

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成为社会融合模式之一的可能性。公共讨论（哈贝马斯后期更加普遍性地将之称为交往行为）同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一样，是一种可能的人类生活协同合作模式。但是，金钱和权力是非话语性的合作模式，这在哈贝马斯晚期的理论中得到了强调，这两种模式并没有为辨别理性和意愿提供内在的空间，并且还会导致统治和物化的倾向。这样，国家和经济都既是民主公共领域的关键话题，也是这一领域的竞争对手。

《结构转型》处理这些关切时，首先试图发展出一套对于现代公共这一范畴的特定历史性的理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序言第1页）^①。因此在启蒙时期，这一范畴便与古希腊的经典范畴有所不同，正如它与当代经过转型的公共范畴有所不不一样。古希腊的理论对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做出了泾渭分明的区分。但在领主们的私人场所中，古希腊的家庭首脑们面对的只有必然。自由只能从公共场所中找到，不过当然，自治公民们的公共领域依赖于每个公民作为一家之主的私人自治（而家庭的大部分成员则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哈贝马斯所探索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

^① 本文对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引用只注明页码，中文译文参照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页码亦以此文本为准。——译者注

虽然与这一图景有一些类似的特征,但它逆转了一个关键因素。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被定义为由私人个体加入对于国家权威的各种事物之辩论的公共领域。与古希腊的概念不同,这里的个体被理解成为主要在私人领域中形成——包括家庭。另外,私人领域也被理解成为一种需要捍卫的自由,以对抗国家的统治。^①

17 至 18 世纪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和转型一脉相承,同时,也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现代国家重新将公共领域构建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古希腊的城邦也这么做了)。在中世纪,公共性更像是一种“地位的标志”(第 7 页)。这是统治者的特征,甚至就连他个人也要随时遵守。在这样一个国王们能够说出“朕即国家”的世界中,一国的公共领域如果除开它的国王和他的宫廷便不能存在。这就是“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全盛期,而领主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第 7 页)。然而慢慢地,宫廷社会发展成为 18 世纪的沙龙这种新的交际。贵族们在早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哈贝马斯并不是要建议让公共领域变成资本主义的仅仅只是这一领域成员的阶级成分^②。相反,是社会成为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又产生了一种特定形式的公共领域^③。这种新的交际方式,再加上从沙龙(以及咖啡馆和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理性-批判性对话,都依赖于基于早期资本主义贸易经济的民族和领土主权国家的兴起。这一过程导致了独立于统治者(或国家)的社会概念,以及独立于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这一市民社会的概念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极为根本,而他的理论转而又为当代对于几乎能够等于私人市场的市民社会的讨论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内涵^④。

① 这样,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公共领域的理解就从根本上与(被阿伦特理想化的)经典的共和传统相矛盾,不仅是对于古希腊的理解不同,对于文艺复兴的理解也不同。参见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1975)。

② 对比伍斯璠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1989) 一书,他驳斥了更简单化的概念,但并没有接受哈贝马斯更加深刻的概念化过程。和伍斯璠一样,哈贝马斯也将国家官僚体系成员视作“资产阶级”的核心阶层,他们新的公共领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第 22~23 页)。另外值得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市民的”一词比“资产阶级”带有被一种不那么排他性的经济含义,正反映出脱离封建主义的转型,并更清晰地强调了城市性。

③ 正因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平民公共领域只是资产阶级的变体,不过我认为这一点从历史角度具有模糊性。

④ 想了解从另一个角度对市民社会的许多援引中暗含的含义收窄所作的评论,参见 C. Taylor, “Modes of Civil Society”, *Public Culture* 3, No. 1 (1990), pp. 95-118。

在 17 至 18 世纪，市民社会发展成为“作为真正的私人自律领域……和国家是对立的”（第 11 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这一市民社会的基础，但它所包含的并不仅限于此。它包含了各种不同的交际组织和对话，都与经济只有松散的联系。尽管如此，经济的转型仍然会导致市民社会的一切其他转型。

在部分地预见本尼迪克·安德森对于“印刷资本主义”分析的叙述中，哈贝马斯表明，印刷媒介密切地参与了早期市场经济超越本地市场的扩张之中。^① 举个例子，长距离贸易意味着新闻的交易几乎与商品的交易一样疾速。商人们需要关于价格和需求的信息，然而，那些满足这类需求的报纸非常迅速地开始承载其他类型的信息。同样的过程帮助产生了范围更加广阔的读写能力，以及一种将印刷文字视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公共”信息的路径。在重商主义时代，这些发展都变成了革命性的，那时的城镇经济被扩大到一国领土的范围，现代国家也成长起来治理这些领土。作为永久行政部门代理人的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获得了常备军队的支持，创造出一种新的公共权力领域。“现在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中的永恒关系（交易所和出版物）是一种连续性的国家行为”（第 17 页）。这样，公共权威便加固为一种易于察觉的对象，与代表公共领域的统治者和旧领地区分开来，也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这样一种狭义的‘公共’与国家是同义词”（第 18 页）。然而，这种公共领域并不与国家机构享有同样的边界，因为这一领域包括了所有那些可能加入讨论国家行政部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人。这一讨论的参与者既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也包括私人公民。

公共领域总体来说就跟市民社会一样，只有在国家成为一种非个人的权力核心时，才能完整地概念化。因此，与古典的公众概念不同，现代公众概念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对立的可能。在这里，哈贝马斯加入了阿伦特的理解，强调了一个社会的私人领域如何可能获得公共的现实性。“市民社会作为去个人化的国家权力的必然产物而出现”（第 19 页^②）。通过将各种关系和组织看作是对公共讨论和/或国家行为的利益所在，将社会视为被创造出来的

^①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2).

^② 此页码为英文原页码，在中文版本中未找到对应语句。引号内为译者自译。其后未注明引文均为中文版页码。——译者注

关系和组织以维系生命并具有公共的现实性就变得可能了^①。这样,某一群受过教育的精英开始将自己想成了公众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将作为公共权力对立面的公共领域这一抽象概念转化成为具体得多的一系列实践。这一公共精英的各成员开始通过这一范畴将自己不仅看作国家行为的对象,也是公共权力的对立面。

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第 23 页)

前述引文的最后一个词组很关键,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体制化不仅是一些利益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对立面,而是关于政治事务的理性-批判性讨论的实践。这样一来,举个例子,批判性推理就在 18 世纪早期进入了出版业,用学者的论文对新闻进行补充,并迅速创造出一种新的季刊类型。公众这一理念本身就基于一种根本又充分的普遍利益概念,关于这一普遍利益的任何讨论都不需要被特殊利益扭曲(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也可以成为一种对某个客观命令——也就是说真相——的理性路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第 32 页)

① 查尔斯·泰勒 (*The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ss., 1989) 在最近强调了在形成现代自我中“肯定平常生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将这一点追溯到了宗教改革的年代。这是一种有联系的发展,只要它涉及了同样的对各种平凡存在——家庭、工作、经济——的要求达到了基本价值的程度。

二

在确立了公共领域的普遍性范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哈贝马斯对于其转型的一些更具体的论证。在介绍性的部分结束之后，《结构转型》的结构是一系列不断重复的主题：社会结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首先得到了分析，分析它们如何构成经典的领域，又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变质转型。^① 虽然人们可能更常因为本书对公共领域之衰退的研究而阅读它，然而前一部分对于公共领域的构成才是更有原创性、更有意思的部分。通观全书，熟悉哈贝马斯之后作品的读者将会看到各种他之后研究主题的前身。

有两项进程帮助公共领域从现代早期的宫廷社会和城市团体中发展出来实现体制化。首先，家庭重新组建为一个私密的领域，为日常生活和由此所带来的经济活动以及家庭父权的领主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提供了可评估的确定基础。其次，公共领域最初是在信件这个世界中形成的，而信件又为公共领域向政治发展铺平了道路。两项进程是相互交织的。举个例子，早期的小说为某一种私密的、多愁善感想象在人们之中流通提供了帮助，与文学公共领域的成员交流他们应该如何理解私密人生的核心。

在哈贝马斯的说法中，私密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主角。“公开批判的自我理解主要靠这样一些源自家庭内在领域中与公众^②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私人经验。这种私人领域是私人性，用时髦术语来说即是丰富而自由的内心世界的历史源头”（第33页）。在新的婚姻家庭中，“私人”并不像在古希腊时那样意味着必然性的负担，也不仅仅意味着拥有财产的经济控制权不受公众干扰。家庭现在被理解为至少部分地与物质再生产有所不同。就像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一

① 第七章“论公众舆论概念”相较于第四章“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其实非常弱。然而，它却符合我所提出的这么个框架，因为公众舆论研究作为“辅助性的科学”是对公共领域变成何种样子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性的反思。尽管如此，它对20世纪公共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处置要比对17至18世纪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的处理浅薄得多。在二战前后，有相对数量较大的文献在研究民主和公共生活，虽然哈贝马斯引用了其中一部分，但就整体来说他从来就没有认真关注过。比如，他就从未体现出对于约翰·杜威（例如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1972）或任何20世纪早期美国改革者或社会福音之传道者的关注。

② 结合上下文，“公众”应为“观众”。——译者注

样, 经济和家庭 (私密领域) 也在私人领域之中有所区分。家庭所培育的主体性“与观众密切相关”是因为它通过表演给其他家庭成员看 (模仿与当时情感主义的文学所提供的理想类型) 的戏剧来体现。

这样一来, 被重新界定的家庭导向了一种人性本身的重新概念化^①。首先, 它强调了一家之主的自治。这依赖于财产的私有权, 但私密家庭的观念却将其排除出核心内容, 并提供了一种对于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人们相信家庭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 “事实上它深深地被卷到了市场需求当中。家庭的尴尬处境, 即它既是社会的代言人, 又以某种方式提前从社会中解放出来, 集中表现在家庭成员的地位上; 一方面, 父权统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 另一方面, 内在人性又把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就其作为私人来讲, 资产阶级的个人既是财产和人格的所有者, 又是众人中之一员, 即既是资产者, 又是个人” (第 59 页)。家庭被理想化为纯粹的人类领域, 在其中“人之为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人性特征受到了家庭的保护” (第 52 页)。与此同时, 家庭的私密性又保证能够提供一种从业已存在的——也就是必然性——束缚中的解放, 因为这一领域是纯粹的内在性, 有其自身的立法而无须屈从任何外部的目的。“同特殊的人性概念一起, 资产阶级当中还普及了一种得到现存压力的救助, 但又不要走向对立的现存观念。坚持内在超越是市民意识形态超出一般意识形态的真正因素; 最初恰恰是在‘人性’经验发端伊始” (第 52 页)。这样一来, 家庭便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的内在批判提供了关键的基础, 因为它教育人们, 有某种对于人性而言极为根本的东西是经济或其他身份所无法夺走的。^②

①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哈贝马斯对于家庭如何帮助一种“纯粹”而一体的人性概念兴起的论述并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削弱宗教在帮助实现这一结果时的作用。而内在化的传统是首先由奥古斯丁提出来的, 在宗教改革期间它又获得了全然不同的新形态, 成为某种平等地在所有人中共享的东西。

② 在这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对于私密领域的讨论预示了他在批判系统关系的“殖民”时将生活世界作为基本立场。南希·弗雷泽论证说这对解放式批判而言是个值得怀疑的立场, 因为它涉及一种对父权家庭的理想化或是对这种家庭自我理想化的接纳 (“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Gender,” in *Unruly Practices*, 1990)。有些令人意外的是,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似乎比在后期交往行为理论中更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就连在早期著作中, 他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只在于平等 (如第 60 页), 而不在于任何其他积极价值性的差异上。

那时的文学，特别是早期的情感主义小说如里查德森的《帕米拉》都既依赖又加强了这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不仅仅关涉小说的内容，还关涉由此类小说而发展出来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第54页）。与此同时，文学公共领域也有助于现代典型的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领域之观点的发展。“由于文化具有了商品形式，而且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因此，就要求它作为成熟的讨论对象，对于这个对象，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自身有着清楚的认识”（第34页）。

除了这种主体性意识之外，文学公共领域对于政治领域最伟大的贡献则在于其体制化基础的发展，涵盖了聚会场所、杂志和社会关系网络等。早期的英国商人们在咖啡馆碰头去讨论贸易事宜，包括“新闻”，而后者后来流传得更加广泛。在18世纪的头10年，伦敦就已经拥有了3000家咖啡馆，每一家都有核心常客人群。这些小圈子的谈话内容逐渐扩展到了国家治理和政治事务上。人们创造出了意见杂志，联系着伦敦数千个小圈子并覆盖了全国。这些内容通常是基于某些特定咖啡馆的，重复的内容通常也是带着欢快讨论的调子。在法国，沙龙和公共场所都坐落于私宅中，它们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搭建了由贵族统治的文学公共领域和逐渐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公共领域之间的桥梁^①。在德国，语言协会则特别能够吸引学者们聚在一起，但也能吸引其他人，而在这些机构之外的公众就很少了。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有些特征极为关键，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是“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第41页）。当然了，这并没有完全实现，然而这一观念本身就十分重要^②。这种“要想相互接受天生的角色，同时又不将它们付诸实现，就必须充分地相互信任，而且必须把敌友关系彻底排除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公众领域之外”（第148页）。这种真正的或合理政策中的共同利益概念就这样从底层巩

① 沙龙另外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则是包括女性，甚至由女性来组织。不过也许这一点反映的是沙龙不断转型的特性，因为逐渐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像咖啡馆和语言协会一样）则绝对是父权男性的天下。

② 对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一种批判早在内特和克鲁格的 *Public Sphere and Experience* 一书中就被提出来，他们认为哈贝马斯并没有足够清楚地区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和现实。

固了“所有范围内”的地位差异。这一特征转而又与第二个关键特征相关联，即理性辩论是所有议题唯一裁决者的观念^①。不论这种规范是如何经常被人们违反，最理性、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是说话者的身份才理应获胜的想法被体制化成为一种可行的主张。第三个特征是，“这样一个公众讨论的先决条件是那些直到那时还未受到质疑的各领域的问题化”^②。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围绕着直至今日到底是哪些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实质上行使着垄断的解释权展开，而这些话题都能公开讨论，因为公众将自己的对话界定为专注于一切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第四个特征是，逐渐出现的公众原则上将其构建为有包容性的。任何人只要能够接触到文化产品——书籍、戏剧、杂志——都至少有可能要求得到讨论文化的公众的注意。“不管公众多么排外，他们永远都不会完全与世隔绝，自成一个牢固的小集团；因为，他们一直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处于一个由所有私人组成的更大的全体之中，而私人作为读者、听众和观众只要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占领讨论对象的市场”（第 42 页）。

这种文学公共领域产生了文学批评的实践（也可参见霍亨达尔 1982 年的著作）。起初，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清晰，因为“像席勒和施莱格这样的评论家并没有自命不凡，以至于不屑从事批评这一副业。通过批判，对文学感兴趣的私人所具有的外行人的批评得以机制化了”（第 193 ~ 194 页）。这样，它便将一种关于那些公众关心又能够直接引入政治讨论的对象的理性 - 批判性对话的形式机制化了：“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第 55 页）。这一转型中的对话中最核心的话题就是绝对主权 VS 普遍、抽象、非人格化法律的问题。市民社会的新公共领域就是通过坚持后者而留下了最初的政治印记，并确信“它本身（即公共舆论）当做这种法律的唯一合法源泉”（第 57 页）。

① “根据这种合理性观念，从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中产生出来的公众舆论要求具有一种力图集正确性和公正性于一体，并且自称道德色彩极浓的合理性”（第 58 页）。

② 此处原文引用英文版第 36 页的话，但在中文译本中未找到对应表述，因此此句为译者自译。——译者注

三

这场争论中最著名的论战者是霍布斯同其他诸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想要限制或限定绝对主权的哲学家间的争论。它最初的核心战场在英国，的确，哈贝马斯将英国视作公共领域发展的典型范例。比如说，就是在那里，审查制度的废除首先标志着公共对话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自由供给的信息再加上教育，对于让公众有机会达成谨慎思考过的意见而不仅仅是共同意见至关重要。也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国家层面的政治对立走出了一条与最终诉诸暴力截然不同的路，“诉诸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而造成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持续争论这样一种形式”（第74页）。

在法国，批判性地争论政治话题的公众直到接近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即便是那时，它也缺乏将它的批判性冲动制度化的能力——直到法国大革命。法国的情况与英国议会制完全不同。后者一直有政治媒介相伴随。法国的政权也绝不会忍受任何一种“忠诚的反对派”。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前数年，那里的哲学家才将他们批判的焦点从艺术、文学和宗教上转移到政治上。俱乐部和杂志的建立都聚焦于经济理论，他们倾向于18世纪70年代英国所激发的灵感。重农主义者是中坚力量，也是他们第一次将这一公共对话中的活动与政府的成员身份结合在一起——这标志着公共舆论变得有效。导致这一点及召开三级议会的契机是政府不断增长的财政危机。大革命随后迅速发生，从大革命一开始，它就既是一场资产阶级公共对话，也是一场暴动。各类俱乐部扮演了不同角色，几乎在一夜之间，范围极其广大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791年宪法就宣布“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最可宝贵的人权之一”（第81页）。

德国落后于法国。在那里“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私人聚会上找到了其立足之地”（第82页）。贵族仍然完全依赖于宫廷，因此并没有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间发展出强有力的沟通渠道，也没有参与建立一个强大的、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市民社会。尽管如此，包含政治内容的杂志数量激增，并在读书会中激起讨论，尽管这一公共领域的政治效力一直都很有有限。

在以上三种不同的安排中，公共领域的某种制度基础被建立起来。哈贝马

斯强调了经济基础 “对于这种 ‘成熟的’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来说, 其社会前提条件在于市场不断获得自由, 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相互之间的事务, 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 (第 84 页)。这样一种自由控制生产资料的崭新而更强有力的私有观念的制度化, 是资本主义对于公共领域的关键性贡献。反映了这种趋势的是欧洲大陆对于民法的法典化, 最基本的个人自由在其中获得了保证。与此同时, 一种不同人之间根本性的平等也建立起来, 与此对应的是商品所有者们在市场中的平等和受过教育的个体在公共领域上的平等。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完全的法律主体, 然而, 所有这些法律主体都成为或多或少没太大区别的一类人^①。这些概念在各国延伸到了放任主义, 甚至在各国间提倡自由贸易的教义之中, 导致了 “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从公共权力机关的指令下彻底解放了出来” 发展到极致, 不过它只持续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顺利的瞬间” (第 88 ~ 89 页)。

从概念上说, 从重农主义者一直到经典经济学家们, 把市场法则看作一种自然秩序极为关键。这样一来, 市民社会也就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在权力和统治上中立的存在, 在市民社会中的对话便也只不过是发现能够让其实现最完整发展的正确政策 “以公共领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声称自己是个公共权力组织, 能够确保公共权力服从独立和自由的私人领域的需要。这样看来, 宪法规范所依据的是一种与现实根本不符的市民社会模式” (第 93 页)。这一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变得可能转型。然而, 在其经典的繁盛期, 公众则仍然将自身理解为运用批判性辩论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妥协或运用某种权力, 而是要发现那些社会形式所内在的法律。 “公众 ‘统治’ 的理想原本是要消灭一切统治制度……公众讨论应当把意志变成理性, 使私人观点得以公开竞争, 并且在切实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务上达成共识” (第 92 页)。这里我们看到不仅反映了经济状况, 还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家庭的婚姻领域中发展出的无定型——或曰纯粹人性——的观念。

① 这种普遍的法定资格与 “人” 这一概念的进一步转型密切相关。例如, 财产拥有者的简单资格取代了各种基于家庭出身、自由身份或封建关系的特定身份。而就连这也仅仅是转型的小小一步而已, 因为 “人” 正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自然类别而不是人造的类别 (参见泰勒 *Sources of the Self* 一书)。因此, 将个体的人当作不加鉴别就已给定的概念, 从而无须任何特殊理论建设的经济学论证, 会出现在同一时代也就并非巧合了。

这一时代的公共领域仍然植根于印刷业中，虽然它已经具有了政治功能。它默认那个更老的精英公众成为所有相关全体公民的组成部分。教育和财产所有权是加入这个公共领域的两个标准。对这两个标准的限定无须被看作是对于公共领域本身的限制，更应该被诠释为“对在私人领域里取得的经济地位的一种纯粹法律认定”（第94~95页）。这两个标准定义了“人”，也就是完全有能力又自主的人，有能力进入对于普遍利益的理性-批判性讨论。“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个人’和‘公民’之间没有差别。因为‘个人’同时也是一个私有财产拥有者，他作为公民就要保护财产秩序的稳定，也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第96页）。这一现象是处于如此的核心地位，哈贝马斯（重复了青年马克思的强调）将之看作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源泉，甚至重要到了为内在批判奠定基础并描述了虚假意识：

如果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社会所需要的虚假意识的体现，如果说它们在某一方面能够拥有真理，从而能超越现实，建立一种乌托邦形式，不管它们是不是仅仅为了替自己辩护，那么，从这个时期开始，也就有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根源应该是在角色和公众舆论中把“财产所有者”与“一般人”等同起来；所谓角色，就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作为公众的私人。（第97页）

四

在第四章中，哈贝马斯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那个年代最“先进”的观念和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在这里，整个运动的发展根本上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到重农学派，到卢梭和康德，最后到黑格尔、马克思、穆勒和托克维尔。逐渐形成发展、后来又遭到批判的一种大众舆论的概念认为，大众舆论就是一种能够通往真理的理性的形式。这一概念取代了将公共舆论看作是相互孤立的个体在集会时的“意见而已”（或任意的看法），在分散的意见映衬下所产生的声誉，以及那些“普通”人的意见。不同的是，公共舆论开始更加正面地指代那些在某个问题上参与了理性-批判性辩论的人的看法。霍布斯关于绝对

主权的理论虽然是非常不具有公众性的，他却仍然为舆论这个词引入了新的一面，因为他将良知（以及意识）等同于舆论。正是他对宗教信仰的贬低也意味着对于其他种类的舆论相应的价值上升。但是，直到洛克才完全地将舆论从纯粹偏见的玷污中解放出来。理性和批判建构了一种受过教育的舆论，而这种舆论从根本上与那些看起来如此庸俗的“普通”舆论完全不同。重农主义者沿着这一发展方向走得更远，他们将批判和舆论都区分开来，至少对于受到启蒙的公众而言是如此。

当然了，卢梭就要更复杂一些。“重农主义者公开支持得到一种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公共领域补充的专制主义；卢梭认为，民主无须公开讨论”（第 117 页）。尽管如此，公意仍然是某种公共舆论，但达成一致的并非辩论，而是人们的内心。不论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如何大相径庭，它们都遵守了基佐的命令：“迫使现有的力量追求普遍真理”（在第 118 页引用了这句话）。既然真理是批判性反思和公意的对象，两者都可以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非政治的。任务就在于以道德以及真理的名义将政治理性化，而不仅仅只是参与到其中。

在这样的追求中，康德变成了更加实用主义的声音，他既继承了卢梭关于所有民众之意志这个观念，又继承了英法启蒙哲学家们对于批判理性中心地位的看法。他的理论是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展最完备的哲学理论。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论证道，个体要十分努力才能不受他人引导，因为他们不能在外部指导下运用理解力。启蒙在自由的公共对话中变得更加可能。“因此，关于启蒙，自我反思和自言自语是一致的。理性的个人使用和公共运用看上去是一致的”（第 122 页）。交流和批判是重中之重^①。这样，即便是康德对于普遍性、世界主义和科学的概念也都是由理性存在者之间的交流中形成的。当康德呼吁启蒙思想家们去放眼“世界”或成为世界人时，公共领域对于这一界定来说必不可少。整个人类的同一性和尊严都被展现出来，部分便是因为其能够加入公共讨论的能力。“这种‘世界’更多地使我们注意到

^①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后来变得更加新康德主义的那个哈贝马斯在《结构转型》一书中已经初露端倪。他引用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吾人所由以决定吾人之以一事物为真实云云，其为确信抑为私见之标准，乃外部的，即传达他人及所发现其对于一切人类理性有效之可能性是也”（第 125 ~ 126 页）。[按：引文见该书 A820 = B848。——译者注]

作为类存在的人，而且其同一性是一种表象：这就是当时在广泛的市民阶层当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第124页）。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有相互冲突的个体意志的理性的人就可能形成和谐状态。它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社会——特别是私人经济——必然地提供了条件将政治转化为道德。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与人合并，是因为私人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秩序，其建构就让正义成为自由贸易所固有的特性^①。

如果说康德最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公共性的哲学，黑格尔就是第一个提出了批判，谴责市民社会的公共性仅仅只是意识形态而已。公共舆论的形式是常识，它以偏见而不是真正知识的形式分散在众人当中，它将偶然与永恒混为一谈。“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观念加以净化。因为充满对抗的无序社会并不是自律私人所具有的摆脱统治和权力中立的交往领域”（第140页）。这一点并没有提供将政治权威转化为理性权威的基础，也没有提供强力或利益转化为理性的基础。市民社会不能够推翻统治，相反还要求统治，因为市民社会有解体的趋势。

这就与马克思批评公共舆论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面具相差不远了。“马克思认为，他所面对的公共领域有悖于其自身的普遍准入原则——公众再也不能要求和国家彻底认同，市民社会和一般社会也不再是一回事”（第142页）。同样地，有产者们当然也不能够等同于普遍的人类。的确，正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才引发了将人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这种异化的区分。私人领域并不能够为公共领域的紧张关系提供真正的缓和，因为总体而言，家庭和私密领域也是由劳动的必要性、父权制的财产制和支配权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会被社会所吸收，而理性的计划将会促进一种“摆脱经济功能的内心世界”（第146页）的发展。在他的这种远景中，人们的互动将会从社会劳动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人际关系也将会从法律规范的需求中解放出来。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念背后，仍然是一种自然秩序的观点，马克思总体来说并不反对它，只是反对以下说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所构成的自然秩序能够让和谐的人际关系得到发展。

^① 哈贝马斯（第132页）找到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两种不同类型：在一个类型中，世界秩序从自然的必要性中就能够产生；而另一个类型中，世界秩序也需要道德政治的推动才行。

哈贝马斯认为,穆勒和托克维尔等自由主义者愿意抛弃某种隐含自然秩序的概念,而这种自然秩序概念足以为一种政治转变为道德的历史哲学奠定基础。他们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不和谐,而他们所建立的自由主义则寻找保障和缓解方法,以及相对而言不那么完美的自由。在他们看来,政治公共领域并不依赖于任何自然基础而存在,不过有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式的确需要通过常识、审慎和现实主义来捍卫^①。他们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公共生活不断扩大、其组成部分不断变化时,如何维系公共生活的各种优点。这种公共领域的民主化是其原初的阶级局限与其开放性原则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选举权改革是 19 世纪的主要话题:需要扩大的是公众,而不是像 18 世纪那样普及公共性原则本身”(第 150 页)。然而,随着公众的扩大,公共舆论本身似乎变成了一种威胁,特别是当它似乎掺杂了一种对于一致性的强制而不是批判性的对话的时候。这样,穆勒和托克维尔都很担心——例如——关于如何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迫害的问题。部分地说,这实际上是关于如何保证自由而批判的思想不受公共舆论本身所影响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种对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最初的理论回应^②。

穆勒和托克维尔接受了一种不考虑整体概念的个人主义,并不得不满足于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世界。

这种因为无法理性地解决公共领域中各种利益竞争的不得已被伪装成视角主义^③的认识论:由于特殊利益再也不能用普遍利益来加以衡量,因此,它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转化而成的舆论具有一种不容还原的核心信仰……理性和公共舆论的同一性缺乏利益的社会整合或普遍利益的理性证明这样的客观保障。(第 152 页)

-
- ① 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更偏向经济主义的那些人,则倾向于勉强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社会的自然基础,辅以一系列显得很客观但事实上是由社会所建立的约束。
 - ② 在某种程度上,根据前述关于本书结构的论述,对于穆勒和托克维尔的讨论似乎更应该放在最后一章(不过那样就会扰乱整本书的历史流畅度)。哈贝马斯似乎认为他们提出了转型后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就像洛克、重农主义者和康德为经典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做的那样。按照这样的思路,本节内容只是对公共舆论研究的补充。
 - ③ 原文为 *perspectivism*,常译作“透视主义”,但根据上下文,应是强调每个人的视角不同、结论也就不同的相对主义,可译作“视角主义”。——译者注

公共领域的“原则”即批判性的公共对话似乎在这一领域的扩展过程中丧失了力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私人领域中的根基被摧毁了。

五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根基的摧毁是通过某种社会的“再封建化”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的前提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分离。其中，公共领域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构成，他们将社会需求传达给国家，而本身就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第201页）。然而，结构转型的发生则是因为一方面私人组织开始不断地获得了公共权力，而国家又渗透进了私人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曾经区别明显，现在却耦合了。当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变得模糊起来，公共领域便必然会转型。伴随着家庭和经济社会的两极化，内心领域不再等同于私人生活，理性—批判性辩论则让路给了文化消费。

私人 and 公共之间关系的模糊最主要涉及了这样一种观念的丧失：私人生活（家庭、经济活动）创造出自主而相对平等的人，他们在公共讨论中可能会强调普遍或公共的利益。首先，在市民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各种不平等不再变得“不予考虑”，相反，倒成了讨论和行动的基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既是因为这些不平等变得更明显（例如巨型企业），也是因为公共领域中囊括了更多人，就让它变得不可能不去面对市民社会的阶级分化（因为，举个例子，这些人中有一部分被剥夺参与权或缺乏对于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而这两者是资产阶级和个人推定拥有自主权的基础）。相关的第二点则是，客观公共利益的概念被取而代之，即便是在理想情况下，也仍由各种利益经过充分谈判后达成的某种妥协替代^①。这样，公共领域的功能便从理性—批判性辩论变成了谈判。“具有政治意义的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直接在私人管理、社团组织、政党和公共管理机关之间展开。公众本身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

① 哈贝马斯通过对法律和法律规范的附注展示了因为丧失了之前能够保证“真理”（这一法律的属性现在听起来可够古老的）的形式普遍性而丧失鉴别公共利益的能力：这种真理“只有当在议会中上升为国家机关的公共领域能够通过公共讨论，从一般利益中确定出必要利益时才能保证”（第203页）。既然这种客观的、正式地证实过的基础丧失之后，法律不仅仅有丧失合法性的可能，还从内部发生了改变。一般法律和特殊规范手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第201页)。这第二个过程就标志着走向福利国家这一运动的开端,市民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用公共领域来要求“社会权利”——国家的服务或保护。换言之,人们尝试着将那些在私人领域中无法解决的冲突——如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矛盾——转移到政治层面来。“社会作为强制组织的特征表现得越明显,也就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第173页)。但是,“广大无产者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占领,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交叠[与马克思的预期相反],从而剥夺了公共领域原有的基础,却未曾赋予它以新的基础”(第202页)。

市民社会的转变也是由于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建立起来,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不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的庞大组织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将职业从纯粹的家庭私人领域或家长制管理的工作场所中剥离出来。这样私人领域便被缩小到了家庭以内。发生了一种“宣称是内心领域的去内心化过程”(第187页)。“当私人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责任重大的角色减退至无甚责任的空闲时间内的纯粹的‘个人’角色时,他们便失去了家庭内部空间的保护,直接陷入半公共力量的作用之中”(第186页)^①。

与此同时,大致作为这些潮流所导致的结果,公共领域变成了一种只是与其早期形象类似的假象。最关键的趋势就是将共享的、批判性的公共对话活动替换为一种更加被动的文化消费和非政治的社交^②。这里哈贝马斯的看法是典型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在这种批判中扮演过重量级角色。他还借用了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ht)《有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一书中对城郊社会生活的描述,从而展示出追求那种自为目的的“群体性”。因此,社交集会的参与者们丧失了康德和18世纪公共领域参与者们将之作为公共生活核心的那种辩论的快乐和美德“在本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交形式找到了替代物,尽管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社交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文学批判和政治批判的禁戒。社交讨论让位于无须担负责任的集体活动”(第190页)。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共享,只不过

① 这与哈贝马斯后期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理论很相似。参见《交往行为理论》,特别是第二卷。

② 也许挺令人惊讶的是,以一种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哈贝马斯将休闲活动视为天然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与生存需求无关(第187页)。

它变成了一种联合消费而不是一种更加积极参与的相互批判（和生产）。“如果大量的个人需求得以满足，那么，个人需求的实现就会带有公共性质，但是，公共领域本身不可能从中产生出来……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换为消费观念。于是，公共交往便消解为形式相同的个人接受行为”（第188页）。例如，以前文学作品的获取不仅仅通过个人的阅读，还通过集体讨论和对文学出版业的批判性对话，而现代的传媒和现代的获取方式则“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第190页）^①。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第196~197页）。

发生的变化是，在接触面扩张的过程中，参与的形式发生了致命的改变。打开了通往公共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经济入口的各种发明——例如平装书（更不用说读者们更高的收入）——都值得称赞。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对于获取条件的心理简化，这种简化通过降低欣赏或参与的能力标准而实现。“人们在和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大众文化消费的痕迹。大众文化消费提供的不是累积的经验，而是倒退的经验”（第192页）。尽管这种在“打交道”和“大众文化消费”之间的区别虽然熟悉却也许有些夸大，然而在经济上扩大的参与可能和心理促进上的区别则更加清晰。然而，很意外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考虑到还有很多并不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不同方式让人们能够进入公共领域：例如，公共教育的扩张和大众文学，或者工人阶级闲暇时间的增加^②。不论如何，他描述的既是公共领域的去政治化，也是它被取消掉

① 哈贝马斯挺令人迷惑地谈论说这是“私人形式的获取”的结果（第190页），但当然，这也不是新状况中独有的情况，实际上就连他自己也认为这对于阅读而言是极为根本的。参见几页之后（第197页）。

② 哈贝马斯赞美了私人获取印刷品，因为它鼓励对于所获得之物保持某种距离，而这种距离则促进了批判性思考。我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他并不认为新的获取方式的特点——如电视——能够与一种更加理性-批判性的公共交换匹配。当然，是否的确如此，以及若真如此它是否与媒体相关仍然值得讨论。哈贝马斯在这里反映了批判“大众文化”的正统观念，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例如，所谓的“新接受理论”以及一些表明人们比大众文化批评家们所认为的大众媒体信息被动接受者要主动得多的经验性研究。See S. Hall, "Culture Studies and the Center: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1980); R. Allen, ed., *Channels of Discourse* (Chapel Hill, 1986); J.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1987); D. Kellner, *Television* (Boulder, 1990). 哈贝马斯在他这本书的两篇致谢中都承认了这一点。

批判性对话后导致的贫瘠。“从长远来看,随着报纸读者的扩大,具有政治批判功能的报刊失去了影响力。相反,摈弃其文学公共领域传统而非政治公共领域传统的文化消费公众占据了主导地位”(第 195 页)。

18 世纪的公共领域是在私人的对话之中形成的,然而它的基础是对于不同私人行为的区分:一种是塑造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并提供动机的私人行为,另一种则是公共生活本身。与此相反,“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第 198 页)。我们在广播、电影和电视传媒中所体验的那种即时性比从文字中获得的要强烈得多^①。这种现象对于公共对话的影响之一就是“囊括”个人特质并注重理性-批判性辩论变得更加困难。这又增添了一种更加普遍性的“对人的多愁善感与对机制相应的玩世不恭”,它削弱了“对公共权力的主观批判能力,即便在客观上这种批判仍旧是可能的”(第 197 页)。一种私人化的政治复活了代表型公共性,因为他们让候选人变成了媒体明星^②。与此同时,新的公共关系行业也发现,在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中操控一致同意很容易。甚至就连国家也得将公民看作是消费者,如果他们和私人企业或政治候选人一样,想要培育一种“无义务约束的善良意愿”(第 230 页)。这当然还涉及一种虚假意识的因素,在其中,已经堕落的大众公共领域按照其更有效力的前身来理解自身:“消费者的这种应和态度是被一种虚假意识所唤起的,即他们认为他们是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在承担参与公共舆论的责任”(第 229~230 页)。甚至连立法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它们变成了一种舞台展示的竞技场,目标是说服大众,而不是在成员间进行批判性辩论的论坛。大众消费从精神上取代了对于拥护理性-批判性一致同意之发展的追求^③。

公众的衰弱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新的(更低的阶级)参与者们变成了简单的消费者或是不合格的参与者。相反,哈贝马斯(通过一些经验性的证据)断言,大众文化的消费随着财富、地位和城市化而增长。最多可以说,

① 哈贝马斯在第十七章中提到,他低估了正规学校教育扩张的积极影响。

② 在这里,哈贝马斯与近期的媒体研究学者们观点更接近。参见 J.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1985)。

③ 第十五章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有趣的视角,强调了具体化及从身体中抽象的重要性——这一主题哈贝马斯处理得很简单,论点也较弱(不过他在第十八章承认了它的重要性)。

对于那些财富等级超越了自己教育等级的人，他们的消费水平最高。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共领域实现了转型，而不仅仅是边缘有所变化而已。

这种转型涉及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瓦解。丧失了一种公共利益的概念，同时又产生了消费性的导向，这时公共领域的成员便丧失了共识基础。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导向造成了一些产品的激增，人们专门设计这些产品来满足不同的口味。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这些产品不仅没怎么直面批判性的讨论，它们甚至都没能够覆盖到整个公众中。“‘所有’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读过理查森的《帕米拉》”（第199页）。今天，没有一个文化产品能够获得如此的普遍覆盖率^①。这种瓦解不仅仅涉及观众的分裂，也涉及在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曾经亲密的关系的转型。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瓦解，知识分子才开始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阶层：那些生产文化及其批判性评论的人。一旦他们变得与众不同，他们就必须对自己解释为何要从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公众中独立出来。所谓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这种意识形态正是对此困境的回应。然而，与此同时，就连那些生产者和批评家中的精英们也经历了一种专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毁掉了它的公共功能。“为了公共使用理性而培植的文化阶层所具有的共识基础坍塌了；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第200页）

六

通过这样的各种转型，公共领域更多地变为一种广告的竞技场而非理性—批判性辩论的场所。立法者们为选民们举办各种展示。特殊利益团体利用广告宣传来增加他们所持立场的优越性，却完全不将这些立场所指的话题变成真正公共辩论的对象。传媒被用来制造能够让消费者们对于那些公共立场或公众人物感同身受的条件。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意味着某种代表性公众的回归，在其中，公众通过欢呼或不欢呼——而不是批判性对话——来表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直接预示了哈贝马斯在《合法性危机》（1975

^① 然而参见第十五章，在其中消费者意识的含义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阅读。

年) 中的论点。公共领域变成国家和企业行为者塑造合法性的场所, 他们并没有恰如其分地回应一个独立而有批判性的公众, 而是向那些社会行为者灌输与这些国家和企业行为者所统治的整体系统的需求相符合的各种动机。唯一的区别是, 在《结构转型》这本早期著作中, 哈贝马斯还暗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拥有一个更加成功的合法化体制。

就连政党也反映出了公共领域的转型。自 19 世纪起, 这些政党已经不再是选民的小组, 而是官僚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动员选民们, 并通过投票吸引他们的心理认同度和赞同。这样, “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成为“超地区的组织, 设有官僚机构, 意识形态保持整合, 并对广大选民进行政治动员”。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那些还不够坚定的选民(有些情况下则是动员那些他们想要指望其舆论而不是真正参与的选民)。这样的政党试图打动人们献出自己的赞成, 却并不为选民们的“政治不成熟”提供政治教育或任何救济(第 203 页)^①。公民投票取代了公共对话。当政党是由选民们组成的时, 他们同时也就是一群理性-批判性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论点是这样的, 立法者们获得了选民们的自由委托权, 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选民们一样, 都是公共领域中自主的参与者, 在理性-批判性讨论中有着同等地位, 所以他们不能在讨论之前就被规定要持何种立场。但是随着大众文化消费的倾向和因为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企业所导致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 立法者们变成了各个政党的代理人(或负责人)。他们不再与选民们一起加入理性-批判性辩论, 而是试图不仅获得独立选民(如不合时宜的自由派理论所说的那样)的支持, 还要获得那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不是理性-批判性辩论, 而是保证在讨价还价中代表这些利益。“当然, 公众成员之间的这种直接接触已经丧失了, 原因在于政党已经变成公共组织体系的一部分,

① 也许这么说更准确: 没有哪段文稿有这样的通用性。当然了, 有些公共事件如太空飞船爆炸或人质危机等的新闻报道, 也的确获得过彻底的通用性, 在某段时间得到了激烈的讨论。不过这些并不能算是文稿, 也基本上不会涉及交流或集体的自我反思。我不认为有哪部电影或是任何一种交流方式成功地得到了整个公众的接纳, 最多只是一两个群体而已。这一段话是当代对于公共对话批判的里程碑之一, 不仅对于右派是这样, 例如, A.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1987), E. D. Hirsch,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New York, 1987), 对于左派也一样, 如 R. Jacoby, *The Las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88)。

而不得不传达和代表从私人领域发展到公共领域的若干组织的利益”（第 239 页）。

随着政党统治政治，而国家和社会基本上相互渗透，旧的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消失了。而新的代表型公共性虽然的确对公众选民的“民主”扩张做出了回应，然而却牺牲了它内部的民主功能。没有任何一种回到之前的资产阶级公众领域的尝试能有什么效果，因为社会变革已经让其根基的矛盾性显露无遗。“凡是想恢复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压缩其公民投票表决的扩张形式的努力，将只会是更严重地削弱公共领域中还存留的原始功能”（第 242 页）。因此，挑战应该是发现一种民主公共对话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可以在这个大规模组织和国家、社会界限模糊的时代挽救批判理性。而哈贝马斯提议道，答案存在于 20 世纪 60 年代之中，那个时代有时被称为“体制内长征”。亦即，各个政党、各类国有机构和官僚组织都必须在自身内部实现民主化，并得到公众的批判。举个例子，在传媒中，需要建立某种机制来确保有更多的民主自决和选拔，以回应所有权的集中化和传媒组织的不断扩大。也许对于一个基于有组织群体间利益谈判的政治体，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①。然而，人们却可以扭转这些组织变得越来越不接受理性 - 批判性对话的趋势“为了实现通过民主形成舆论和共识的功能，它们的内部结构首先应该按照公共性原则加以阻止，而且应该在制度上允许有一种政党内部或组织内部的民主存在——允许顺利交往和公开批评”（第 243 页）。

而转变各种制度并重新夺回公共领域的斗争和实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意识形态中核心的真理，就是要努力使公共性成为合乎逻辑的、进步性的一致同意形成过程的来源，而不是操纵公共舆论的机会。只有在那时，公共领域才能成为政治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的游戏场“‘公共舆论’作为批判力量或作为展示和操纵力量，其含义是不同的；前者使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得以公开，而后者则公开了个人与机构、消费品与供货单”（第 283 页）。人们经常兜售的关于全民公决和公共舆论研究中的民主潜力其实微乎其微，因为两者本身都没有提供形成经过推论的意志的场所。^②“本来

^① 哈利·博伊特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参见该书第十三章和其中引用的材料。

^② 参见本人“Populist Politics,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Large Scale Societal Integration”一文中的讨论，*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pp. 219 - 241。

意义上的公众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新见，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第 252 页）。公众舆论研究更类似于与它同时发展起来的大众心理学领域而不是民主实践，它是对公共管理学的一种辅助性科学而不是真正公共讨论的基础或替代品。

公共领域的理念要求基于理性 - 批判性对话的社会整合。换句话说，社会整合就应该基于交往而不是统治。“交往”在这个文本中并不仅仅指分享人们现有的想法和知识，还是一种潜在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由辩论本身来推动。如果像自由主义理论所建议的那样，否定大规模社会组织所带来的暗示，想象一种只有独立的私人个体而没有大组织，也没有在共同善的认同中一直存在的利益分裂的公共领域，那么，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公共性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政体中……今天，只有作为社会和政治权力运作的合理化才能得以实现。这些权力是在互相竞争的组织的互相监督下进行运作的，这些组织本身的自身内部结构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它们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都是建立在公共性的基础上的”（第 244 页）。合理化很有限——就像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私人间批判性辩论的合理化一样有限——然而，它仍然是一种合理化。

七

《结构转型》的第二部分没有第一部分那么令人满意。如果说前几章成功地从经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重新找回了一种有价值的批判理想，哈贝马斯最终却没有找到一种方法，能够非常有效地将他批评理想的实现希望植根于他对于发达的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解之中。他对于组织内公众性和民主的观念非常重要，然而，因为缺乏一种达成同意的公共利益，这种观念只能改善妥协中的代表性，却不能通过理性 - 批判性讨论这一载体达到政治与道德的统一。这一僵局的核心问题在于，哈贝马斯没能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一种制度性的基础，能够形成有效的政治公共领域，其特点和功能与早期资本主义和国家形成时的政治公共领域相符，却又能够在范围和参与度上与后期

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情况相符。

哈贝马斯通过三种方式回应了这个问题。^① 第一，特别是在《合法性危机》一书中，他强调政府大规模干涉经济的后果。正如我前面注释提到过的，在《结构转型》中已经体现出它会动摇市民社会中作为私人领域一部分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之根基。下一步，哈贝马斯论证说这种国家干涉有效地阻挡了对于名副其实的资本之矛盾的关注，这样将政治行为从潜在的功能转型引开，直指国家本身。福利国家的民主要求通过显示出它们的政策是为选民的总体利益服务的，来达到福利国家的合法化。这一结果不仅是真正的国家干涉（从功能上要求它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功能）所导致的，也是由于公共领域转型成了范围广泛的社会利益竞争获得国家行为的竞技场。因为这些利益的冲突，国家只得面对危机，在危机中，它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充分的工作动力和对现存政权的忠诚^②。

第二，哈贝马斯提出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区分。他论证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概念化为一种社会总体，因为它被分割为独立的各个领域，又通过不同的基础相互协调。生活世界就是私人关系和（处于最好状态的）交往行为的领域。然而与之对立的还有一个系统，其秩序是基于非语言引导的媒介（金钱和权力），通过功能性或控制论的反馈协调社会，毫不关心个人。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分割不可能被克服，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会产生其辩证的超越。另外，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性融合（而那些梦想着不顾这种大规模社会融合而行动不仅只是浪漫幻想，还很危险，因为规模的下降只能通过灾难性的方式实现），大规模的现代社会

① 在这里，哈贝马斯预计他后期（在帕森和卢曼之后）关于系统性融合的讨论总会与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理论》，特别是第二卷）相对立且保持距离，这种系统性融合对于现代……的大规模社会而言十分必要。然而，就像哈贝马斯在第十七章讨论过的那样，他后来作出结论，认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不应该被视作一个社会整体的各个方面，而是社会这一双重性概念的两个独立部分。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的概念化过程有缺陷，因为它暗示了国家机器和经济内在民主化的可能性。现在他将其视作“系统性融合的行动领域”，是不可能从内部实现民主转型的。我们不应该追求行政权力和金钱系统的转型，而是应该追求通过更好地维护边界来阻止或限制它们对生活世界的入侵。

② 参见本人“Populist Politics,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Large Scale Societal Integration”一文中的讨论，*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pp. 219 - 241。

不可能出现。^① 尽管如此,生活世界是基本人类价值的核心,并正在进行自身的合理化进程,我们需要捍卫它不受持续的系统性媒介的侵袭。

第三,哈贝马斯将他的关注点从作为民主意志形成基础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建设转向了一切言语中普遍包含的有效性要求^②。在后者中,他发现了进步性交往合理化的基础和人际交往非工具性组织的能力。这样,哈贝马斯便从民主(虽然公共领域仍然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核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奠基转向依靠一种不受历史和时间影响的人类交往能力^③。交往行为为社会融合提供了金钱和权力之外的可能基础。一方面,哈贝马斯还将生活世界的直接人际关系理想化,作为非人性化、具体化的系统融合之对立面存在。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近期的著作中,他又探讨了如法律这样的特定制度化对话发展作为社会合理化和融合之手段的交往行为的能力^④。更概括一点说,“在立法过程中一种激进民主的变化,其目标是找到社会融合的力量之间的平衡,这样,社会融合的团结力量——‘生产的交往力量’——能够战胜另外两种控制的资源亦即金钱和行政权力,随即成功地确定生活世界那些实践导向的要求。”^⑤

① 在后面的内容中,我只追溯了哈贝马斯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一条线索,我并没有尝试去描述他全部的鸿篇巨作,其中包括了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作品、知识分子历史、当代政治以及某些特定哲学问题。特别是我并没有探索他的尝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剩下的那些日子中的尝试——重新思考科学和社会生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过很明显它们也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部作品关系密切,特别是它对于合理化概念的发展。参见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1974, orig. 1963-1971),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1988, orig. 1967),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1971; orig. 1968); 和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Boston, 1970; orig. 1968-1969)。

② 哈贝马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他的交往行为类别主要出现在《交往行为理论》的第一卷中。

③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体系仍然还是黑格尔主义的,他将一种抽象的交往潜能置于所有言语中,既受到了语言的工具性运用的挑战,也(最终)在更发达的社会融合形式中能够辩证地冲抵。因此,如科尔伯格的道德判断理论之类的著作很吸引哈贝马斯,因为它似乎从经验上验证了,在个人的生理学层面和集体的历史层面的确存在一种道德能力的累积获取过程。参见哈贝马斯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Justice and Solidarity: On the Discussion Concerning ‘Stage b’”, *Philosophical Forum* 21 (1989-1990), pp. 32-51。当哈贝马斯不再接受和依赖科尔伯格的理论(它引发了大范围的批评)时,他自己的理论不仅丧失了经验性范例,也失去了一种可以定位道德人进行实践理性的人类个体的发展的论证。

④ 参见“法律与道德”一文。哈贝马斯也坚持认为政治和道德间有密切联系,坚持康德主义关于实践理性将这两者连接起来的能力。参见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1990)。

⑤ 第十七章第三部分。

哈贝马斯继续寻找一种途径来恢复早期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实践对于形式民主的规范性理念，并发展出辨别可能导致这一民主发展的各种社会方向的基础^①。更确切地说，他继续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制造困境（而不是辩证产生的危机，而辩证又能解决它们），另外通过乌托邦式的集体行为去解决困境，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还毁灭了早期的基础^②。但是，当《结构转型》找到了在公共领域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中实践理性运用于政治的基础，交往行为理论则在不受历史和时间限制、不断进化的交往能力或主体间构成的理性能力中找到了它们，这种理性能力的本质就是交往。公共领域仍然是一种理想，但它变成了交往行为进化的或然产物而非其基础。

《结构转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他的这些做法变得必不可少呢？更准确地说，哈贝马斯是不是非得放弃这本书中更加依赖于历史条件和社会体制的策略才能找到同时实现政治合理化和民主化的基础？我想答案就在该书的后几章中。从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自己似乎更被他对于公共领域衰落的表述说服，而不是他对于通过组织内改革和将公共性原则运用到组织间关系中复兴公共领域的建议。他似乎看不到真正社会制度进步的基础，不管是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还是国家的制度都一样。所以他决定转向其他地方。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才有可能巩固一种真正的普遍利益的发展和认知。哈贝马斯不再相信真正公共领域的能力，也不相信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他便寻求民主不那么历史性、更带超越性的基础。这就是他在对人类交往能力的革命性研究中找到的一——在所有言语中内含的那些可能性。这让他在这个仍四分五裂并服从资本主义和官僚权力统治的世界中，获得了复兴康德主义理想和更普遍的民主理想的基础。

八

哈贝马斯的著作改变得更多的是策略而不是总体目标。其原因可能不仅是

① 我不是说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只强调了这些规范性理念，但这些理念是核心。

② “The New Obscurity: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Exhaustion of Utopian Energies”, in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Cambridge, Mass., 1989), pp. 48 - 70.

简单的“理论发展”，而是《结构转型》中某种更加特殊的内在弱点导致的。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只能提出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不可能修正任何一个。大部分问题主要在于对于一些重要话题分析得不够或是有所遗漏。因此，提出这些问题就能够直接指出对该书中的分析进行扩展和改良的可能性。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虽然《结构转型》相较于哈贝马斯后期著作而言，在理论发展上多有不及，但它的历史特殊性和对于坚实的社会 - 制度基础的理解让这本书比其后期著作更有优势^①。

《结构转型》的一个核心弱点在于它没有对转型后“有组织的”或“后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给予与“经典”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同等的对待。哈贝马斯倾向于用洛克和康德来判断 18 世纪，用马克思和穆勒来判断 19 世纪，而用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来判断 20 世纪。这样，他对 20 世纪的描述并没有囊括类似的思想史，而是试图去认真考察领军思想家们，从他们被意识形态扭曲过的写作中发现真理，这是哈贝马斯在研究 17、18、19 世纪时的特点。对于早期那些时代，相反他并没有去考察那些“廉价惊悚小说”、毛骨悚然的罪案和丑闻，或是另外一些传媒业不那么理性 - 批判性的分支，以及那些周游各处的演说家们所煽动的民众，对于群众和政治对话的关系也只有顺眼一瞥。结果就是，也许他过高估计了公共领域的衰落。20 世纪 60 年代对于批判性政治公众性的复活（它从那时起拒绝销声匿迹）能够进一步佐证这一观点。另外，大众传媒的公共影响也许并不一定像《结构转型》中所建议的那样完全是负面的，也许有比哈贝马斯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空间给予其他的民主传媒策略^②。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哈贝马斯对于文化和身份问题的处理。艾利（Eley）就指出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时明显地缺乏对民族主义的关注（不过民族

① J. 科恩就曾建议说“哈贝马斯早期和后期的作品”在完成理解现代性的得失和解放及民主的可能性这一任务时，“都各自有其不可或缺性，但这种不可或缺性又依赖于两者的联系”。参见“Why More Political Theory”，第 94 页。

② 参见 Nicholas Garnham,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P. Golding, G. Buckdock and P. Schlesinger, eds.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New York, 1986), pp. 37 - 54; M. Warner,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以及我的“Populist Politics”一文。哈贝马斯还有可能并没有完全抓住印刷传媒的独特性，将其只理解为言语的延伸（与德里达相反）。无论如何，不同传媒对于交往造成的不同这一问题在哈贝马斯后期的理论中仍然没有解决。他的理论显然是基于面对面的交往，因此它的原则也许不能直接扩展到以电子为媒介的交往中。

主义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挑战了哈贝马斯所提供的说法)。这也许部分地要归因于总体来说对于 19 世纪公共意识形态缺乏关注。不过似乎还要部分地归因于哈贝马斯对文化和身份建设问题关注不足^①。的确,这在方法论上反映了哈贝马斯在经验性分析时对于各种文化变量并不关注,他倾向于按照时代分类,却几乎对于其他的国别或文化的特殊性不作考虑。^②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于公共领域“衰落”的讨论中,即便我们承认,现在公共领域解决问题的功能的确比过去行使得要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对话不再和以前一样是充满活力的理解——包括自我理解——的源泉。用哈贝马斯采取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公共领域扮演了一个关键的“揭露世界”的角色,这个角色与它解决问题的角色并驾齐驱,甚至可能独立于后者。而这种揭露世界的角色并不局限于非政治的文化。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对于同性恋、少数民族和青年人的理解通常都会涉及在政治斗争中问题和身份的关键性重新界定。从“经典”全盛期的公共领域发展到现在,其中一个关键的变化在于,被称作身份政治的议题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不要以为这一主题曾经不存在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可能比其他任何思想对话都更加鲜明地指出,公共/私人的二分法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么一清二楚,这样设想只会造成内在的困难。因为哈贝马斯认为保持这种区分十分重要,所以困难会更深入。这不仅仅只是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描述,因为在他讨论如何在系统的入侵之下捍卫生活世界的界限时,这个困难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

当哈贝马斯将身份和利益视作在私人领域中解决,然后又完整地形成并带入公共领域时,他便推翻了自己的理论。首先,在文学公共领域的讨论中,他初步展示了小说如何促进了关于自我和主体性的讨论,并在一个新建立起的私人领域中强化了主要身份的授予。资产阶级和人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核心主题是

-
- ① 哈贝马斯对于文化作为关于资产阶级主体性问题对话之基础的讨论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尽管如此,它也仍然是相对而言未作区分的一种理解。
- ② 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他其他的著作,《结构转型》对于文化特殊性的关注要多很多。《对于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反思》一文是个很好的范例,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给予文化变量更多关注后会在何处对他的著作做出修改。哈贝马斯意识到了东中欧后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他曾经评论说“一个公共领域要想实现其政治功能不仅仅要求这一法治国家的制度保证,还需要文化传统、社会化模式、政治文化,以及习惯于自由的民众都支持这种精神。”(第四节)

一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可能依靠的身份建设,但这种身份建设同时也发生在公共对话中。正如南希·弗莱泽(Nancy Fraser)提到的,公共审议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关于某种已经确立的公共善的审议,它很可能是一种澄清(我还要加上“形成”)各种利益的时机。因此,对于公共/私人、系统/生活世界二分的理解就是哈贝马斯会在他寻找公共利益上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它的理论架构要求他找到一种先于公共生活的公共利益,而他的这些假设导致他在生活世界或曰私人领域中寻找这种利益和“真正的人性”。女性主义批判不仅显示出哈贝马斯没有对公共领域带有性别偏向的特征有足够关注,他只用了一种性别中立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将性别问题主题化。这种批判还指出私人/公共二本身通过确立公共性是私人身份的抽象这一点,在身份的不同问题上强加了一种性别中立的逻辑。不同也许被“囊括”或容忍了,然而很难从哈贝马斯的说法中看出将其积极地主题化的需要。

哈贝马斯对于宗教的忽视也与这一点息息相关。哈贝马斯暗自追随了那些启蒙哲学家的步伐,想象宗教和科学之间是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阿多诺和霍克海姆(至少在他年老之前)虽然批判了启蒙,却仍然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随着启蒙的发展,宗教一定会衰落。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与理性-批判性对话的出现关系密切,这一点从未受到过质疑。正是这种观念让哈贝马斯形成了对于宗教的盲点,而宗教既是早期公共领域中心议题之一,也是其持续性的制度基础^①。不仅在英格兰是这样——在那里,宗教论战与文学论战在为政治公共领域铺平道路上可能同等重要——在法国也是如此,许多启蒙思想领袖们对于教士的坚决反对正是哈贝马斯所继承的这种反宗教假设的始祖。科学可能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特别是它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对话,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对于知识的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对话,至少在意识形态中能够让参与者的特殊利益得到审查并将参与者的身份视为不相关因素。这很像是文学公共领域受到严格限制的版本,但正如哈贝马斯后来的作品中所建议的那

① 天主教会在波兰最近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让这个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在其他的运动和公共领域中也扮演过关键角色。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美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中保持持续的对话,20世纪早期的社会福音运动、18~19世纪英美的反奴隶运动等等。同样重要的是,宗教一直都是现代时期的许多公共领域中选民所关注的对象和制度基础。宗教主张也经常成为理性-批判性公共对话的一部分,而不仅限于在教众之间讨论。

样，从科学观念扩展到社会科学，这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创造中十分关键的一刻^①。另一方面，科学意识形态是一些观念的源头，这些观念认为，公共政策是否正确，显然可以从公共对话中确定，并潜在地比这些对话地位更高。这样一来，那些重农主义者以及特别是孔多塞才会认为公共对话虽然关键，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跟许多共和主义者不一样，对他们而言，这种对话只不过是也许能够终结理性社会进程的手段之一而已。并不是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有组织资本主义的时代，才有一个专门的非公共性科学被用来为管理理性服务，并与公共领域竞争。与这些文化和身份问题相关的是，哈贝马斯忽略了社会运动。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认识也许与文学资产阶级理想太过于一致，简单地将它想象成为这么一个个体将自己的观念和批判带入的领域。然而，公共对话和民主政治，都似乎会受到社会运动的关键性影响。虽然这样的运动可能被定义为次政治，或强调它们试图运用强力来达到工具性的目的，但在此两种情况下，这些社会运动仍然对于公共对话议程的转向并让新的问题走向前台极为关键。常规的公共领域理性 - 批判性对话不可能同时讨论所有一切。肯定有某种由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权力或社会运动所推动的关注点重组总是存在。由此，最后这个可能性对于民主而言是非常关键的。另外，社会运动不仅是重塑问题的场合，还是重塑身份的场合。贯穿于整个现代，社会运动有时会成为新的声音获得合法性的场所（我所指的不仅是对于那些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接纳，还有那些之前就被囊括于其中的人身份的变化）^②。哈贝马斯的理论中社会运动确实同时也反映了对于能动性、对于不断塑造和重塑公共领域及其参与者的各类抗争的不关注。他对于公共领域及其转型的研究更像是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潜在发展的反思。

如果我们偏离对于每个国家都肯定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想法，那么社会运动就是我们所能构想出的不同类型附属公共领域之一。许多研究者都论证说存

-
- ① 很令人意外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对于各类经济问题的行省级对话——如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爱丁堡、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看作是公共领域的先驱或补充。他的论述完全聚焦于首都城市。他也许还夸大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公共领域在为最终的政治公共领域奠基中的重要性。
- ② 这是一个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熟悉的主题。然而，“新社会运动”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最近才发生的变化。在我看来，这是贯穿于整个现代的社会运动的中心部分——早到劳工运动和第二次觉醒，一直到最近的生态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

在重层的、有时重合或相互竞争的公共领域。而这些讨论的部分背景再次来源于哈贝马斯对于公共和私人二分的趋向。这种区分与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分很相似，而后一种二分则导致了每一个国家肯定只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假设。不过，对我来说，如果简单宣称有许多公共领域的话，只会有所损失，因为那会让我们又要再找一个新的名词来描述这些公共领域中的交往关系。也许更有成效的方式是将公共领域视作涉及各种松散联系的领域。在这一网络中，也许有一种或多或少较为平衡的发展。在几乎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情况下，在较为松散的总体领域中都会有更密集的交流群，而这些交流群也许只是整体的更带有偏见的微缩版本，就像各个城市在国家中也都有自己的公共对话，而不同社区在城市中也一样。然而这些交流群也可能是围绕着更大的社会中不同话题、类型、人或基本的互动关系而组织起来的。这样，就会有某种女权主义的公共领域，或反公共的，以及一个在律师之间的附属公共领域。这些领域显然是不同的。对于这样的交流群，我们必须不仅关注它所聚焦的主题内容，还要关注它的内部是如何组织的，它如何维系自身的界限和相较于更大的公共领域而言更强的内聚力，以及它独立的存在到底仅仅只折射了某阶层的利益、某种功能性的劳动分工，抑或人们感到需要有堡垒来抵抗某种统治性意识形态的霸权。这个问题不仅指出了将公共领域概念化时使用一种更加多元化、更开放的手段的重要性，也支持了分析其内部组织的需求，而这在《结构转型》一书中几乎完全被忽视。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哈贝马斯完全没有提及权力关系、交往网络、问题的全貌和公共领域影响的结构，而只是非常粗略地提及了部分和派系的存在。^① 而在该书的后半部分，这些主要存在于对于衰落的叙述中。然而，无论公共领域的性质如何，它都必然是一个以社会形式组织起来的领域，有独特的分界线、权力关系和其他本质的特点。^②

关于这个问题，被援引最多也最明显的例子是，哈贝马斯决定他可以将

-
- ① 与此相关的是，虽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会最小化社会地位区分的重要性，他却对于参与者的职业或宗教身份等因素不感兴趣。例如，他隐约地提到了却没有仔细观察在早期公共领域中国家行政机构成员比例不均的参与。[这一问题可参见 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1989)。]
- ② 皮埃尔·布迪厄分析这些领域的方法也许是发展得最好的，但绝不是唯一的一种。参见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1988),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1991)。

18 至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作一种派生的对话搁置一旁。在某种程度上，哈贝马斯在这里断定了多重公共领域的存在，然而却很有欺骗性，因为他建议，这种公众领域不仅仅是派生的，也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被压制的……变体”（前言第 8 页）。虽然它继续作为一种隐藏的存在（通过不同的社会运动而一直存在着），却不仅不能够获得统治地位，还有将自身导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意图。关于这种对手工艺人、工人和其他人之对话的界定有多么不公已经说了很多，关键是要注意到，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遗漏。缺乏对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关注同样也是在充分地描述冲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整个力量领域这一任务中的失败。当然，虽然哈贝马斯没有全力论述这一主题，但他仍清楚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仅导向保护市民社会抵御国家，也同样导向在市民社会中维护一种统治体系。然而，同样是事实的一点是，贯穿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整个存在的，是它弥漫着自下而上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形式不仅有更加广阔的包容性，还有一些更基本的挑战，以及将新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不仅如此，在建立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些对资产阶级公共性而言必不可少的一些特性——如出版自由——的抗争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活动家们实施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支配性总是不完全的，且是在一个部分地由它与其他反叛性对话的关系而组成的领域内实行这种支配。

九

哈贝马斯的作品暗示了《结构转型》的重点在于展示公共领域的衰落，并论证进步只能依靠对于大众社会各种状况的民主性和解，而不是推翻它们或回到任何黄金年代。这本书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其对于 20 世纪一般大众的批判，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前半本书，哈贝马斯制定了公共领域的历史性范畴，并试图从中引出一种规范性的理想。对于许多评论者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去区分哈贝马斯在何种程度上讨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论性理想和实践性现状。很明显，作为一种历史性描述，这一点很重要。然而，从理论上讲，两者之间准确的平衡似乎没那么重要。很关键的是，哈贝马斯两者都有论述，因为这不仅让他能够从有缺陷的物质实践中重新

发掘理想，也能够确定何种社会基础才能够让这一理想部分地实现（其改变便意味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当哈贝马斯写作《结构转型》时，他仍然希望能够展现出，一套确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如何能引出一些理想的，它们不能实现这些理想，却能够为这些社会历史条件进步性的转型提供动力。后来他拒绝了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他历史重建的来源。他认为这种批判不讨人喜欢地与一种整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解相联系，与黑格尔式的观念与现实对立相联系，与一种无法理解金钱和权力系统的重大自主权的社会概念相联系。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仍然没有放弃内在批判的观念^①。他将内在性从特殊历史条件转移到了人类状况的普遍特质之上。这就让他能够为他的规范性论证奠定基础，令其远离任意性，却也让它远离了任何对于历史进程的珍贵追寻。也就是说，相较于指出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什么更容易说服人们、如何才能在与理想相差甚远的情况下批判哪些交往更好或更糟糕，交往伦理学在建立一套规范理想的工作中更出色。换言之，即便一个人并没有很强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信念，《结构转型》的历史特殊性也还是有些优势的。

尽管如此，又或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哈贝马斯从历史和意识形态评判上的转向，他继续参与了确认仍然很有价值的关于现代性的规范性理想这一工程并处于中心地位。他早期批判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矛盾，后期却捍卫它还未完成的工程。这一工程涉及对于社会和民主的意识形态的理性化，而它与政治公共领域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相差无几。30年前他们恢复了形式民主，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关键性补充，如今看来这在与“新保守主义者”的抗争中同样重要^②。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时常表现得像是后现代主义者，有时还会令人误解地像是激进分子或进步主义者，虽然这这一学派也有真实的洞见，然而最糟糕的状态下，后现代主义者们展示出一种玩世不恭和相对主义，两者相结合便允许了对邪恶的标准化。更笼统地说，他们将进步的标准与乌托邦的僵化一并抛弃了。

① S. Benhabib,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1986) 对于这一点提供了清晰的讨论。

②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1987);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Cambridge, Mass., 1989).

《结构转型》对于这一场抗争的贡献良多。举个例子，正是由于它的历史特殊性，让它在交往行为理论的新康德主义的普遍主义引发担忧时显得更有吸引力。虽然《结构转型》并非总是论证缜密，但这本书仍然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入口，走向一个对于差异和身份诸问题更加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不是说它就能解决在认真处理差异问题同时又要避免相对主义、避免将问题普遍化时所内在的难题。然而，正如在其他论题上一样，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对于那些发展这个框架并用许多不同方法来运用它的人来说极有裨益。

哈贝马斯第一本书最重要的使命可能会被证明是这一点：并不以一个权威宣言的方式独立于世，而是一种成果颇丰的生成器，生成了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在这本书出版30年后，它到底能否在英语世界也造成同样的效果值得好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英文译本似乎无比恰逢其时。也许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主题，也因为它将经济、社会结构、交往、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各个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历史特殊性分析中交织在了一起。这种多层次、跨学科的叙述是哈贝马斯之所以能够提供对于公共生活的社会性本性和基础最为丰富、论述最完整的概念化过程的核心原因。当学者们开始试图理解在与此主题相关的各类不同话题时与日俱增的经验性研究成果，这本书将会成为他们在理论上起航时不可或缺的起始点。它还将继续为一种关于经验性工作的丰富传统提供理论。

如果对于《结构转型》的这种新的研究最终证明哈贝马斯错了，揭示出玩世不恭和乌托邦能量的耗尽并没有到达将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视为毫无力量的程度，这种正好相反的效果也许才是最好的。毫无疑问，这本书与许多当代的对话产生共鸣，它们认为一个强有力的规范性公共性概念的恢复和延伸的确正在当代的议事日程之上。没有任何图书会比《结构转型》更有帮助。

On “Spirit of Utopia”

—Interview in Tübingen , September 1 , 1974

E. Bloch / Translated by Jin Shoutie

/ 110

Abstract: Ernst Bloch’s “Spirit of Utopia” of the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18 , revised version published in 1923 , and later , the authors were included in these two versions of self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6 and Volume 3 ,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and preference of this work. “Spirit of Utopia” is known as a masterpiece of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ism in early 20th century. From the style point of view , this work has the daring , uninhibited fantasy poem features: language obscure , quirky , vent subjective sprit , describe of the intuitive intention and convey the Messianic prophecy , revealed the eternal magic of the mind meaning; from the subject point of view , this works against the war , power and exploitation , and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on the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ity , celebrated the dawn and awakening of human and advocate human reversion and moral reconstruction , proposed the slogan of “soul , Messiah and Revelation”.

Keywords: Self-encounter; Philosophy of Music; Karl Marx; Revelatio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raig Calhoun / Traslated by Tao Wenjia

/ 121

Abstract: Habermas’ early work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alyzed the emergence , 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of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emphasized on the core element of this public sphere: the rational-critical debate.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first reviewed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e book , especially that of the first half. Second ,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Habermas’ belief that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era of advanced capitalism was inevitable that made him to turn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theory in his later works. Last but not least ,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re were some innate problems 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 such as the lack of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ublic sphere of advanced capitalism ,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culture , identity , religion and science on the public sphere , as well as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of multiple public spheres.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the attempt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ould lead to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Habermas' theory.

Keywords: Public Sphere; Rational-Critical; Ideology

Pragmatism as Naturalized Hegelianism: Overcoming on the Theory of World of Heidegger in His Early Philosophy

Qiang Yihua

/ 161

Abstract: The essay takes Heidegger's early philosoph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his theory of worl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theory of world.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thinks in the order of existence the world precedes people'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However , it has experienced the fate of retreat from ontology to epistemology and from epistemology to linguistics in the situation of dogmatism because it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and take it as the most original research object before the world occur to man. Opposite of this , Heidegger thinks in the order of occurrence that the world that occur to man in man's existent activities is the most original world. Man becomes also man in his own existent activities. Man's existent activities both included the existential knowledge (view) and existential language (speech)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links to man's existent activities and world's occurrence. According to Heidegger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as well as epistemology and linguistics is just a derivative of the existential world as well as view and speech. Therefor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falls in a misunderstanding from ancient ontology , his own theory of world is just a theory of error correction. We think that world can only be the world which man live in , the world to occur to man is the most original world for people , so Heidegger's the theory of world mean a progres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Keywords: World; Ontology; Epistemology; Linguistics; Existence; Occurrence